

WANG SHIJING WENJI

王士菁月文集

第四卷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王士莘文集

第四卷

WANG SHIJING WENJI 北京鲁迅博物馆资助出版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士菁文集·第4卷/王士菁著.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81119-841-6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王士菁—文集 ②文学史—中国—文集
③汉字—字体—文集 IV. ①C52 ②I209—53 ③H12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2808 号

WANGSHIJING WENJI

王士菁文集(第四卷)

王士菁 著

责任编辑 王济民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 (总编室) 68982468 (发行部)

网 址 www.cupn.com.cn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 092mm 1/16

印 张 37

字 数 437 千

总定价 388.00 元 (全四卷)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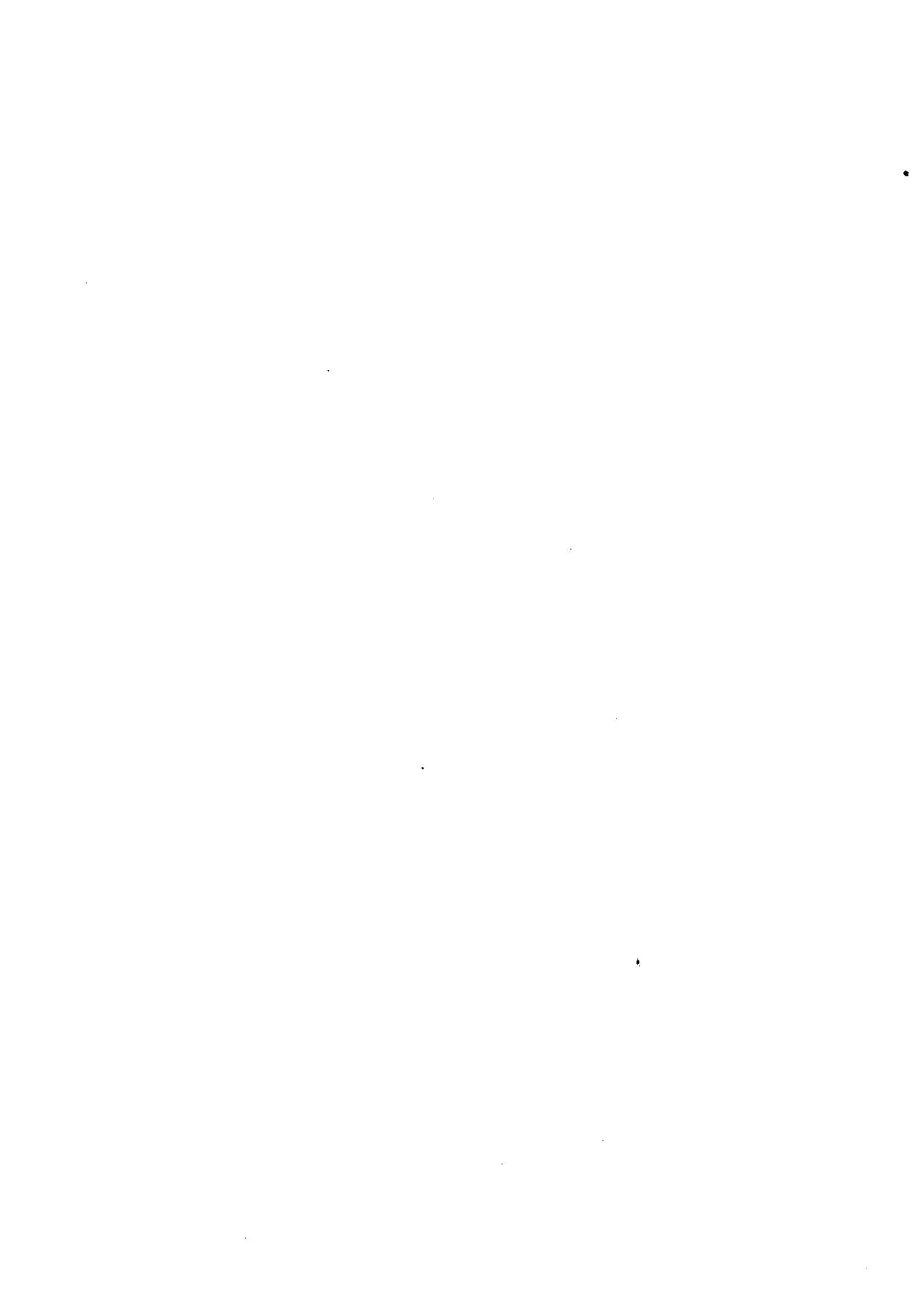
目 录

	中国文学史——从屈原到鲁迅的通俗讲话
3	写在前面
14	第一讲 中国文学的起源
39	第二讲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
70	第三讲 我国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
89	第四讲 古代人民的幽默和讽刺
113	第五讲 汉魏六朝的无名诗人
139	第六讲 五言诗的兴起
169	第七讲 古小说钩沉
199	第八讲 “文学的自觉时代”
221	第九讲 诗歌大国里的诗歌
235	第十讲 唐诗
276	第十一讲 宋词
314	第十二讲 元曲
335	第十三讲 宋元的戏曲和话本
349	第十四讲 明清传奇
368	第十五讲 明清小说(一)
385	第十六讲 明清小说(二)
406	第十七讲 明清小说(三)

419	第十八讲 民族的觉醒与复兴
445	结束语
中国字体变迁史简编	
457	上编
459	引言
463	从《说文解字》说起
473	“字是什么人造的?”
478	“写字就是画画”
481	再从“钞古碑”说起
488	“六书”——“造字之本”
494	汉字形体变迁的基本规律
500	汉字形体变迁和书法之成为艺术
511	下编
513	甲骨文、金文
523	篆书
528	隶书
534	真书
568	简化
576	结束语
578	附图目录
583	后记

中国文学史

——从屈原到鲁迅的通俗讲话



写在前面

中国文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中国文学的历史——编写此书的主要目的在于为初学者提供准确的历史知识，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文学主流的发展规律和作家创作的经验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文学应占有适当的位置。在各族人民中间曾经产生过一些著名或无名的诗人、散文家、小说家、戏剧家和说唱家。他们以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和说唱文学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作品，不断丰富中华民族的文化、文学和艺术。二十四史的“艺文志”和“文苑传”不断记录下他们光辉的业绩；历代公私藏书机构虽屡遭兵火战乱，仍保存了丰富的文化典籍；此外，还有埋藏在地下的，更有待我们去发掘；流传在各族人民口头上的，也有待我们去搜集和整理。这一切都是我国各族人民应该引以为自豪的文化遗产。

对于这些文化遗产，自古以来，历代有识之士即从各种不同角度去认识，并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不同程度的整理，

其中着重论述作家和作品的专论或专著不断出现。近代以来，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出版了许多新型的不同于“艺文志”或“文苑传”的文学史著作，对历史上的作家和作品进行较有系统的论述。大致说来，从清末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所编讲义《中国文学史》开始，其后流行较广的有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1918年，中华书局印行)、胡适的《国语文学史》(1927年，北京文化学社印行；后又改名为《白话文学史》上卷，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印行)、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0年，商务印书馆开始印行)、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1949年，中华书局陆续出齐)等等。此外，在全国解放前，还有以“断代史”、“专史”等各种不同内容和形式、篇幅也繁简不一的文学史多部，如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1915年，商务印书馆印行)、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1920年，北京大学出版部印行)、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年，商务印书馆开始印行，为当时大学丛书之一)等等。这也是我们丰富的文化遗产。在上述这些方面，许多前辈学者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此外，在解放前，我国新文学奠基人鲁迅也曾写过一部《中国小说史略》，在他生前又曾想写一部中国文学史。著名诗人、学者和民主战士闻一多，生前也曾想写一部很有特色的中国文学史。很可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都没有能够实现这一宿愿，但他们也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这些意见至今仍值得我们重视并且有待深入进行探讨。

在鲁迅逝世之后不久，冯雪峰在《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一文中曾经写道：

“关于中国文学史，鲁迅先生恐怕从写《中国小说史略》的时

候已经开始准备，收集材料了罢。……我只知道一九二七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曾写过一个大纲，不过似乎是为讲授用的，断片的研究也曾发表过一篇，而想写文学史及想如何写法，则到上海以后，却时常谈起，但有些材料鲁迅先生都集中到北平去，最后两年则在上海又购买了为查考用的许多书籍。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之间，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时候，他常常谈的多是文学史方面的问题。……这时他很有即开手写的趋向，因为他曾说：‘或者先写 sketch，像《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那样，一断片一断片的写起来再说……’但终因为别的在他看来是更紧迫的工作所牵制，并没有实现他的宿愿；而且到他逝世前也仍在同样情形下，不克实现他的计划。”①

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在给许广平的信（1926年9月14日）中，曾经写道：

“我的功课，大约每周当有六小时，因为语堂希望我多讲，情不可却。其中两点（即两小时的授课时间，下同。——引用者注）是小说史，无须豫备；两点是专书研究，须豫备；两点是中国文学史，须编讲义。看看这里旧存的讲义，则我随便讲讲就够了，但我还想认真一点，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②

① 《片断回忆》，1937年10月15日于上海。见《雪峰文集》第4卷第20—21页。着重点是引用者加的。

② 《两地书》四一。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117页。着重点是引用者加的。

鲁迅在定居上海时致曹聚仁的信(1933年6月18日)中，又曾写道：

“中国学问，待从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此种物件，都须褫其华袞，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乌烟瘴气，莫名其妙。其他如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文祸史……都未有人著手。然而又怎能著手？居今之世，纵使在决堤灌水，飞机掷弹范围之外，也难得数年粮食，一屋图书。我数年前，曾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各一部，先从长编入手，但即此长编，已成难事，剪取欤，无此许多书，赴图书馆抄录欤，上海就没有图书馆，即有之，一人无此精力与时光，请书记又有欠薪之惧，所以直到现在，还是空谈。”^①

许寿裳先生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五)《杂谈著作》中，更详细地谈到鲁迅准备编写中国文学史的情况以及他列举的计划中的部分章节目录；也由于上述原因，这部中国文学史仍未能完成。^② 鲁迅计划中的中国文学史虽然未能完成，但他在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中，关于编写文学史的主张，关于文学史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作家和作品的意见，至今仍值得我们重视。特别是因为这些意见来自他对于社会生活的细致观察，来自他的变革社会的实践和长期文学创作所积累的经验，那就不是一般的泛泛之谈了。他的一些真知灼见，对于我们编写

^① 《致曹聚仁》。见《鲁迅全集》第12卷第184页。

^② 参看《亡友鲁迅印象记》第52—53页。

中国文学史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集诗人、学者与民主战士于一身，最后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的闻一多先生，也曾想写一部具有特色的中国文学史。他晚年在昆明几个大学曾经作过一系列的通俗讲演，从屈原到鲁迅都有所论述，这便是他构思中的中国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可惜，他为了中国人民崇高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没有完成正在构思中的中国文学史。他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为初学中国文学史的学生着想，同时也为广大关心文学遗产的读者，特别是为初学者着想，先从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入手，“说明背景”，“诠释词义”，“校正文字”，使读者读懂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然后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技巧和社会意义，为他们提供准确的历史知识。他的广为人们称道的《诗新台鸿字说》这篇著名论文，即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例。他的《古典新义》等专著，也都是从这些方面为读者着想，因而取得的科研成果。如《周易义证类纂》、《诗经新义》、《离骚解诂》等著作，对于我们阅读和理解古典文学作品，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认为：“较古的文学作品所以难读，大概不出三种原因。（一）先作品而存在的时代背景与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因年代久远，史料不足，难于了解；（二）作品所用的语言文字，尤其那些‘约定俗成’的白字（训诂家所谓‘假借字’）最易陷读者于多歧亡羊的苦境；（三）后作品而产生的传本的伪误，往往也误人不浅。”^①他的《古典新义》等著作，主要即是为了解决有些读者阅读古典文学作品的困难问题。记得在做学生初读《诗经》时，闻先生向我们介绍的入门书，即有清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同时还有“高邮王氏父子”的王念孙和王

^① 《楚辞校补·引言》。见《闻一多全集》（二）第341页。

引之的《经义述闻》和《经传释词》等书，即是为此目的。记得在做学生时，闻先生还不断提醒我们：认识古代汉字对于读懂古典文学作品是非常重要的。不懂不要装懂，千万不可望文生义。强不知以为知，害人害己。他以身作则，从“新月派”诗人自觉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历史的考据”方面，从唐诗扩展到《诗经》、《楚辞》；后来，“他于是读卜辞，读铜器铭文，在这些里面找训诂的源头”^①。这便是他走过的从诗人到学者的道路。闻先生的这些意见，对于我们编写中国文学史，在方法论上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朱自清先生也特别看重中国人自己编写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文学史。他在为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所写的序言中说：“早期的中国文学史大概不免直接、间接的以日本人的著述为样本，后来是自行编纂了，可是还不免早期的影响。这些文学史大概包罗经史子集直到小说剧曲八股文，像具体而微的百科全书，缺少的是‘见’，是‘识’，是‘史观’。”^②朱先生对于闻先生为了探究中国原始社会生活，曾对古代神话进行研究，如《伏羲考》、《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等著名论文，这些方面所取得的科研成果，非常赞扬；对于闻先生运用唯物史观来探讨中华民族原始文化尤为重视，曾着重指出：“他不但研究文化人类学，还研究佛罗依德的心理分析学来照明原始社会生活这个对象。从集体到人民，从男女到饮食，只要再跨上一步；所以他终于研究起唯物史观来了，要在这基础上建筑起中国文学史。从后来关于文学的

① 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见《闻一多全集》(一)第17页。

② 《朱自清文集》(三)第208页。

几回演讲，可以看出他已经是跨着这一步。”^①

闻先生又曾把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分为四大阶段八个时期，从本土文化的黎明期开始，纵观“外来影响”与“民间影响”，展望未来的“世界性的趋势”，准备写出一部体大思精、气魄雄伟的唯物史观的中国文学史^②。正在他已经“跨着这一步”，“然而他为民主运动献出了生命，再也来不及打下这个中国文学史的基础了”。朱先生回忆说：“就在被难的前几个月，他还在和我说要写一部唯物史观的中国文学史。”^③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闻先生的这部中国文学史虽然没有写成，但在他留给我们的许多著作中，关于中国古典文学作家与作品的精确考释和论证，也非泛泛之谈。他的一些真知灼见，对于我们编写中国文学史也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

自从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众多的专家学者的努力，近五十年来陆续出现不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都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一些文学史著作。这是一个新的发展。但是，鲁迅先生在二三十年代、闻一多先生在三四十年代提出的如何编写中国文学史的一些问题和意见，仍值得我们继续探讨。

60年代，我们约请郭绍虞先生主编中国历代文论时，他在《中国历代文论选》的《前言》和《例言》中曾经指出：“我国文学理论遗产极为

^① 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见《闻一多全集》（一）第18页。着重点是引用者所加。朱先生在这里所说的“关于文学的几回演讲”，即指闻先生晚年在昆明几个大学所作的关于从屈原到鲁迅的一系列的通俗讲话。

^② 在他的遗稿中有一个提纲，但未形成详细的有系统的论述。现编入《闻一多全集》（新编十二卷本）第10卷第22—36页。

^③ 见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见《闻一多全集》（一）第14页。

丰富，它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这种理论都是从文学作品的创作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可以受以前或当时创作实践的影响，也可影响到当时或以后的创作实践。”他又指出：“我国古代文学，有它自己的发展历史和独特的民族内容与形式，文学理论中许多用语，都是前人从创作实践经验中概括出来的，也是我们今天应该继承的东西。”^①郭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伟大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即具有高瞻远瞩的气魄，不断吸收自己民族的前人创作经验，继承优良的民族传统。与此同时，又以我为主，不断采取“拿来主义”，吸收外来的鲜活有益的经验，为我所用，以丰富自己的创作，促进文学创作事业的繁荣。我们现在编写中国文学史，首先要为广大读者，特别是为初学者提供准确的历史知识，探讨中国文学主流的发展规律并总结作家创作的经验。郭先生的意见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郭先生也已作古，但他的意见仍值得我们继续发扬。

在改革开放新形势迅速发展下的今天，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者，我们在编写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史时，首先应该继承前人从社会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学习运用唯物史观来探讨中国古代文学主流的发展规律并总结中国古代作家的创作经验，同时也应吸收外来的鲜活的有益的经验。这对于繁荣社会主义的新文学创作，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

文学创作活动和作家的社会生活实践密切相连，总是分不开的。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在历史长河中，任何时代都是人民创造历史，也创造了文学和艺术，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内容和形式以及各类典型。

^① 《中国历代文论选》(上册)第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着重点是引用者所加。

不同的文学艺术创作方法以及艺术技巧也是从作家的创作实践中产生并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我们对于古代文学史上的作家及其作品的评价，也只能用社会生活实践去衡量，检验这些作家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这些作品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实践也是检验作家创作的唯一标准。

社会生活实践既是作家创作的源泉，它对于一个作家的创作来说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社会生活是充满着矛盾的，因此，每个作家在思想上也必然充满着矛盾。这矛盾便是促使他从事创作活动的动力，一个最根本的动力。这一个思想上的矛盾，正是社会生活中的矛盾的反映。古往今来许多著名的或无名氏作家和诗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他们要把理想变为现实，这中间就必须经过社会实践。在历史上，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为了摆脱压迫和剥削，不断追求自由和解放，这便是他们伟大而崇高的理想。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即使某些理想初步实现了，现实社会生活仍会提出更高的理想，还要通过更高的社会实践，才能达到更高的要求。因此，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争自由求解放的事业是正义的，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我国历史上，奴隶起来反对奴隶主，农民起来反对封建主，而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被压迫的中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是完全正义的，必然要取得胜利，并推动历史前进。这一切都是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客观事实。现代中国文学奠基人鲁迅曾经说过：“文人也是人。”人即应该具有人的正常的思想感情。当“风雨如磐暗故园”的时候，不甘屈辱的中华儿女很自然地便会想到“我以我血荐轩辕”，为争取祖国的独立和自由不惜献出最宝贵的生命。爱国诗人闻一多也曾说过：“诗人的主要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不论是在历史上或现实

的社会生活当中，在国家尚未消失、民族压迫依然存在的时候，就应该成为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古往今来的任何一个作家，只要他具有一般人的良知，他就不可能不爱自己的乡土、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特别是在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不仅是宋代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的高尚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不仅是明代学者和诗人顾炎武的抱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也是清末民族英雄和诗人林则徐的心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同样地，在中国文学史上，岳飞和文天祥都给我们留下了光辉的不朽的形象和诗篇，而秦桧、贾似道之流，他们却留下了什么呢？他们留下的是万世的骂名！在众多古代作家和诗人篇幅浩瀚的作品中，确有许多名篇佳作，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学习的范本，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也显示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无私忘我的奉献。

在我国多民族的文学宝库中，作家众多，作品卷帙浩繁，内容博大精深，历代前贤及当今专家学者对于这一个难度很大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都曾作出过贡献。但是，要想做好普及工作，为一个初学古典文学的爱好者提供准确的历史知识，为初学写作者提出可供参考的文学发展规律和作家创作经验，也确非易事，更远非笔者的力所能及。不过，对于笔者，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现在，不妨从起主导作用的主要作家和重要作品谈起，首先介绍中国文学的主流，从屈原到鲁迅作一些通俗性的介绍，以就正于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甚盼得到多方面的指正。